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從聖經漢譯框架圖看六個聖經漢譯本的定位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ao, Yuxia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9 13:07:01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90">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90</a>

# 从圣经汉译框架图看六个圣经汉译本的定位

高玉霞

**内容提要:** 1919年“官话和合本”诞生后,圣经汉译进入“后和合本”时代,华人译者担当圣经汉译主体,圣经汉译呈现多元化局面,读者反应不一。本文以本雅明的“纯语言”为理想译本标杆,将方梦之提出的“一体三环”译学框架同神学框架进行交叉,构建圣经汉译框架图,解释圣经汉译多元化的原因,并在此框架内对六个现代圣经汉译本进行对照和定位。

**关键词:** 圣经汉译;框架图;一体三环;定位

## Positioning of the Six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in Light of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Framework

GAO Yuxia

**Abstract:** Since the CUV's publication in 1919, Chinese scholars had replaced missionary translators, generating dozens of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which were called a time of “post-CUV” versions. The diversification in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resulted in a mixed bag in terms of the

readers' response. The paper combines Walter BENJAMIN's theory with FANG Mengzhi's idea of "one body with three rings" as the framework for studies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is diversification, followed by a comparative survey of the positioning of the six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in light of the framework.

**Key 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framework; one body with three rings; positioning

1919年“官话和合本”诞生后,圣经汉译进入“后和合本”(post-Union Versions)时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陆续有三十多种圣经汉译本面世,几乎每隔三年就会有新译本及修订本出现。这些译本有的是联合圣经公会主持翻译的,有的是基督教会主持翻译的,有的是华人学者独立翻译的。译本中既有面向各教派的通用本,也有“恢复本”等面向特定教派的专用本。近十多年来,又出现了宣称“荣神益人”<sup>①</sup>或标榜“无关信仰”<sup>②</sup>的新译。一言以蔽之,现代圣经汉译出现了译者身份多样、翻译指导思想多样、译本功能多样的多元化局面。就这些译本的评价问题,读者和研究者众说纷纭。本文尝试以本雅明的“纯语言”为理想译本的标杆,将方梦之提出的“一体三环”译学框架同神学框架进行交叉,构建圣经汉译框架图,以解释圣经汉译多元化的原因,并在此框架内对六个现代圣经汉译本进行对照和定位。

---

① “荣神益人”本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提出的,该书第8至10章中讨论有关吃祭偶像的食物问题,并在结论中提出这一原则。圣经翻译是教会和基督徒的重要事工之一,美籍华人学者王汉川(1950— )兼有文学艺术教育背景和基督教(新教)牧师身份,近十几年持续重译圣经。他在2014年6月12日与任东升的电子邮件通信中认为,“荣神益人”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和动力,包括翻译圣经,但不限于翻译圣经。

② 冯象近十多年陆续翻译出版了圣经新译,他认为翻译圣经无关信仰。见颜菁:《冯象:重译圣经,无关信仰》,《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20日。

## 一、圣经汉译框架构建

在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多学科交叉的趋势下,令人耳目一新的翻译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不同的学科背景中发展起来”<sup>①</sup>。这些理论发展延伸了翻译研究的疆域。然而,翻译理论的多样化和研究学科界线的日益模糊也使研究者陷入新的困惑。研究者指出,翻译学研究的总的趋势已“从‘多学科’的接口研究扩展到‘无学科’的境界”<sup>②</sup>，“虽说已有人试图修墙筑垒,可学科界线正变得漏洞百出”<sup>③</sup>。针对这种状况,方梦之提出了“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sup>④</sup>,对译学本体、学科渊源和发展脉络作出高度概括,对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作了“大胆而理性的预测”<sup>⑤</sup>。

### 1. 译学“一体三环”

方梦之最早于2005年9月提出“一体三环”论,经过其2006年阐述、2010年修订,于2013年推出最新版,图示如下:

---

① 黄远鹏:《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科学评价探索——基于三个全面性翻译理论的研究》(博士论文),济南:山东大学,2009年。

② 赵彦春:《翻译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③ 曹明伦:《Translation Studies 在中国的名与实》,《上海翻译》2006年第3期,第1—6页。

④ 包通法:《“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的哲学认识构式》,《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第17—20页。

⑤ 王宏:《重温译学研究“一体三环”论——祝贺方梦之先生八十诞辰》,《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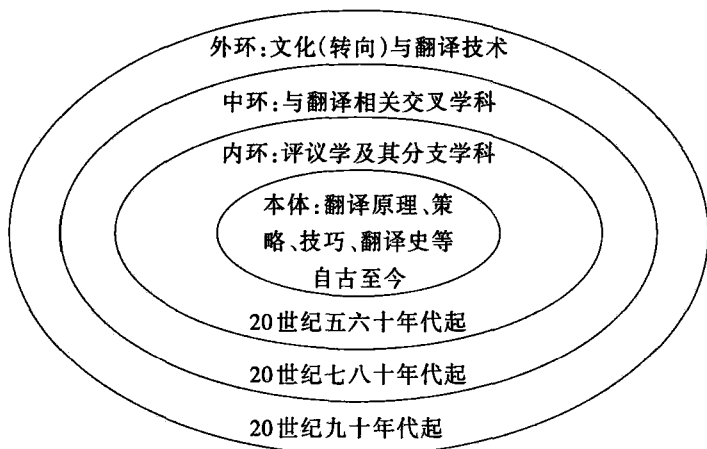


图 1: 译学“一体三环”<sup>①</sup>

“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理清了翻译研究纷繁复杂、杂乱无序、碎片化的知性现象”，使“翻译研究与知性体系在构式上静态与动态相切，跳出线性的思维，进而由平面思维向立体综合思维转换，呈现了既有终极性、又有知识论构式的动态开放式知性体系”。<sup>②</sup>“一体三环”论的思维模式可以为各种圣经汉译本的起因、现状、发展的解释及其综合评价提供思路上的启示。

## 2. 纯语言理论

言明自己“一直是按照一种神学方式来研究和思考”<sup>③</sup>的本雅明，以《创世记》第1至2章为逻辑前提，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个由“圣言/神言”、“物言”和“人言”构成的总体（totality of language）：

- 
- ① 王宏：《重温译学研究“一体三环”论——祝贺方梦之先生八十诞辰》，《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16页。
- ② 包通法：《“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的哲学认识构式》，《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2期，第17-20页。
- ③ 转引自李河：《巴别塔的重建与结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

- (1)神言(Wort):生发万物,运转自然;
- (2)物言(Ursprache):即万物以生命形态体现上帝的创造力;
- (3)人言(Sprache):介于神、物之间。

本雅明把语言视为从超验到经验的系统,神言处于最高层次,神言表现物的精神就成“物言”,而“人言”是对物言的翻译,是由具体的命名活动构成的符号系统。三种语言的不同等级导致语言从伊甸园的单一语言堕落成多种语言(the multiplicity of language),或曰人类将“物”的无声语言翻译成了不同的人词语。在本雅明的阐释中,原初的伊甸园语言是完美统一、尚未分化的知识,亚当和夏娃通过“原罪”所获得的善恶知识是外在、无效的知识。“堕落”标志着人类词语的诞生,“名”被外在化了,失去了其直接的魔力(指语言与精神不可分的状态)。因为神言构成了世界意义统一性的基础,语言的意义来源于神并复归神。<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本雅明又在《译者的任务》(1923)一文中从“语言的亲缘关系”入手,提出了“纯语言”概念。他把语言比作一个完好无损的瓷瓶,认为语言如同被打碎的瓷瓶碎片,人类只有通过“翻译”这种行为,找到可以丝丝入扣的花瓶的各个碎片,才能逐步接近“纯语言”,进而接近“神言”这种“更伟大的语言”。<sup>②</sup>

翻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理论、思想从某个特定的语言的‘牢笼’下解放出来,让这些理论、思想归全人类所有”<sup>③</sup>。而在圣经原文中,语言与启示是一体的,没有丝毫张力。因此,本雅明认为“圣经的隔行对照译本是所有翻译的原型和理想”<sup>④</sup>。也就是说,基于“纯语言”的译本是一切“理想译本”之标杆。

---

① 参见袁文彬:《本雅明的语言观》,《外语学刊》2006年第1期,第12—22页。

②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1923年),陈浪译,载于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1—332页。

③ 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④ 同上,第328—329页。

### 3. 圣经汉译框架图

“一体三环”论给出了译学研究的体系模型,说明了翻译的复杂性,其模型构建方法同样可以借鉴到其他学科研究中。我们模仿译学的“一体三环”来建构神学的“一体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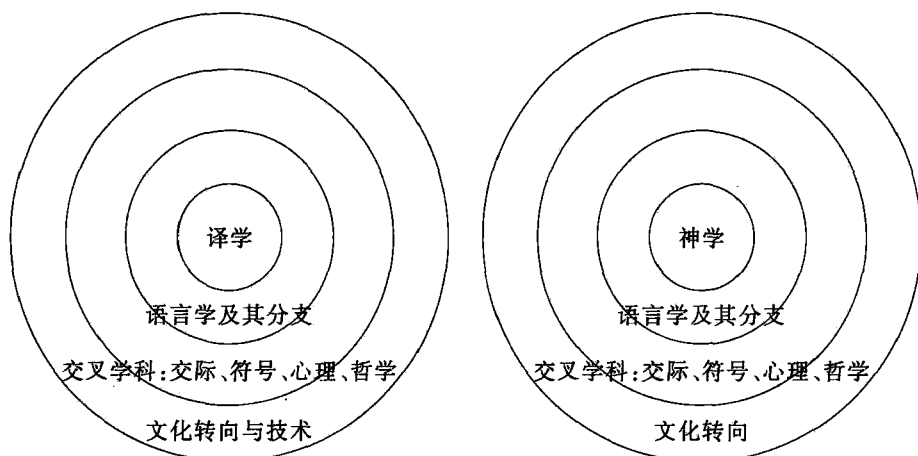


图2:译学“一体三环”和神学“一体三环”

译学的三环是构建其一体的支撑,而神学的三环则是其一体的“下凡”。无论是译学还是神学,其三环由内而外分别为一环、二环、三环,并有以下特点:

(1)出现时间渐变:越是靠近圆心的环出现时间越早,如译学的“三环”,由内向外出现的时间分别是:50至60年代、70至80年代、90年代。神学的“三环”,由于西方在这方面研究古久,无法一一考究,我们的假定亦如是。

(2)接受程度渐变:越靠近中心环,越成熟确定,并容易被大多数人理解。越往外,不确定因素越多,离本体越远,越不容易被大众理解。

(3)背离程度渐变:越靠近圆心的环,各环内越是与圆心接近的部分,其内容越具有理论核心的印记与色彩,越远离圆心,其内容与理论核心背离越远。

翻译研究本身存在“神学之维”<sup>①</sup>,译学与神学又都存在着极为相似的“一体三环”,这是否暗示译学研究与神学研究之间存在“互照关系”呢?

本体意义上的译学和神学各自的交叉学科之间出现了交集,如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哲学等,而这些也正是当代圣经翻译研究最为关切的学科。圣经汉译以翻译为手段,以神学、历史和文学为内容,因此,要真正理清圣经汉译的理论框架,就有必要将“翻译”与“神学”交叉融合。这两大系统的交集正是圣经译本的诞生地。两者交叉后可构建出如下圣经汉译框架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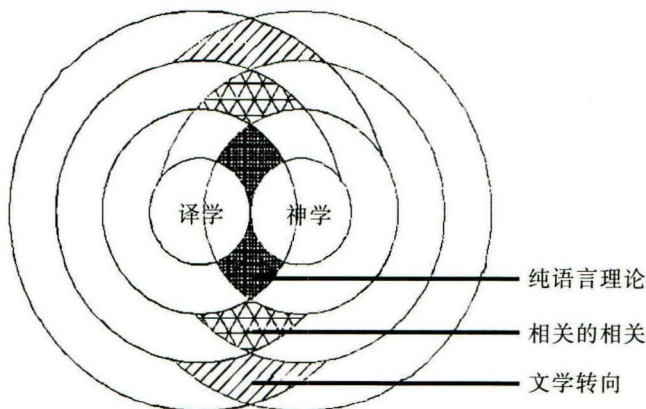


图3:圣经汉译理论框架图

如图所示,译学与神学在本体意义上(暂时)未形成交集。译学一环的语言学分支研究和神学一环的语言学研究结合后,就“下凡”为“纯语言”理论,译学语言与神学语言完全一致。只有“纯语言”才会出现于此,与“神的圣言”契合,不必再做诠释和解释,所有人都能明白。每个圣经汉译本的出现,都是译者所认知的译学与神学结合的结果,也都必然能在这个理论框

<sup>①</sup> 任东升:《翻译研究的神学之维》,《外语研究》2010年第4期,第68—74页。

架模型中找到其位置所在。

为更好地说明各译本在框架模型中的位置,有必要对圣经汉译本的多元、多样性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 二、圣经汉译本多元化的原因

从表面看,圣经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多样性发展是导致译本多元化的直接原因,然而,进一步探索译本翻译全过程涉及的各种因素——作者、译者、读者的宗教信仰与处境,原文和译文的诠释系统等,就会发现,圣经汉译通常牵涉四个密切关联的环节。

(1)“原本意义”上的圣经译文与其当时所在教会组织的诠释传统类似于“夫—妻”关系,诠释传统实际上是作为译文的隐性信息而存在,它们的结合才是译文要表达的全部含义,如下图:



图4:译文与诠释传统

诠释传统是由当时语言的诠释系统和教会传统构建的。由于时代环境、受众结构与处境等的变化,宗教内部的信仰传统也会发生调整,甚至变革,直接导致语言诠释系统的变化。当诠释传统发生异变时,就会与译本“离婚”,去寻找更适宜的“新”译本,就会出现:



图5:译意的变化

(2)译者作为第一读者,首先通过原文理解作者的意图,然后通过译文将自己的理解传递给读者。在此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现象,即圣经文本的“灵意”起到神秘作用,如对圣经作者的“默示”,对译者和读者的“感动”等,都影响到直接读者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将这种冥冥中的灵意精神模拟为“纯语言”作用。一方面,尽管两千年来圣经的作者和译者众多,原文和各种译文存在差异,然而各种译本的“意思”(meaning)却大体相同。另一方面,译者同时也是读者,他对原文的理解直接影响到译文读者;译者不同,译文也就会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不同,译文也会不同。因为,译文是给特定读者看的,译者会充分考虑读者的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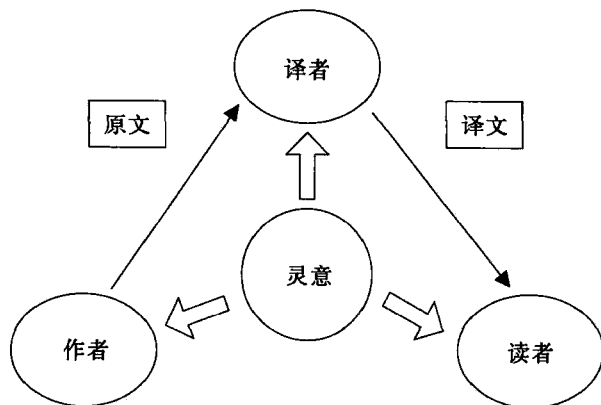


图6:诠释(理解)的传递

(3)作者、译者和读者尽管都属于同一信仰群体,都借助圣经共同构成该宗教的信仰体系,即圣经的“合一性”(organic unity)<sup>①</sup>,但三者的信仰内容存在差异,并非完全一致。三者教会组织之内,于时间长河之中传递着并不完全相同、而存在微差的宗教传统(包括经文诠释和信仰实践),甚

<sup>①</sup> 赖若瀚:《实用释经法》,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准印证(吉)(92)准字第149号,1992年,第26页。

至读者与后续读者之间的宗教传统传递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宗教传统的变化也意味着诠释传统的变化,意味着译本在译意上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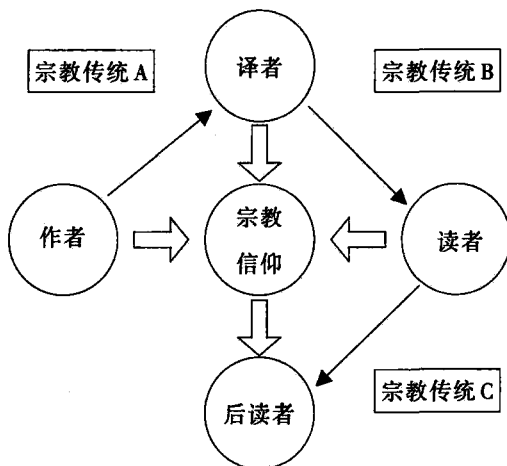


图7:信仰构成与传递

(4)根据“纯语言”理论,任何译本都是原文的“碎片”,依此类推,不同“译本”形态的圣经承载的各自的信仰体系,亦是完整信仰之“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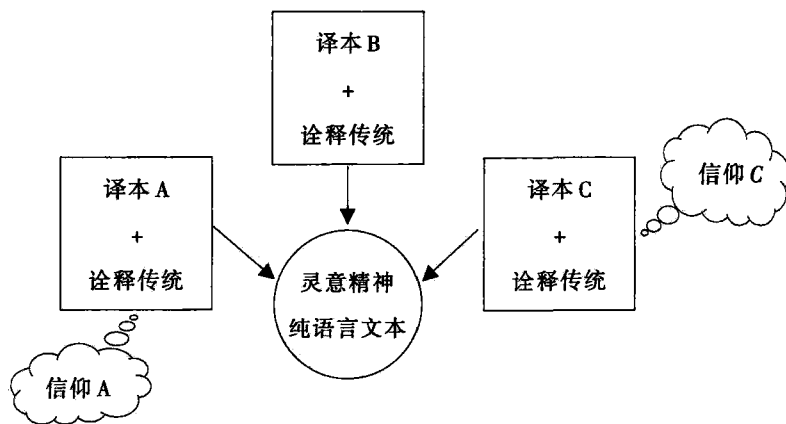


图8:多种译本与纯语言文本关系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翻译就是解释,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等著名解释学家都对“翻译即解释”这一命题有过深入的探讨。<sup>①</sup>由图4到图8,归纳起来可以看到,各种译本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乃是解释或诠释的不同。每一个译本都有其对应的诠释传统,及接纳该传统的人群。简言之,每个圣经译本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依据语言诠释系统和教会传统相结合而构成的诠释传统,可以划分出译本的人群适用等级范围;适用范围之大小正是译本的差异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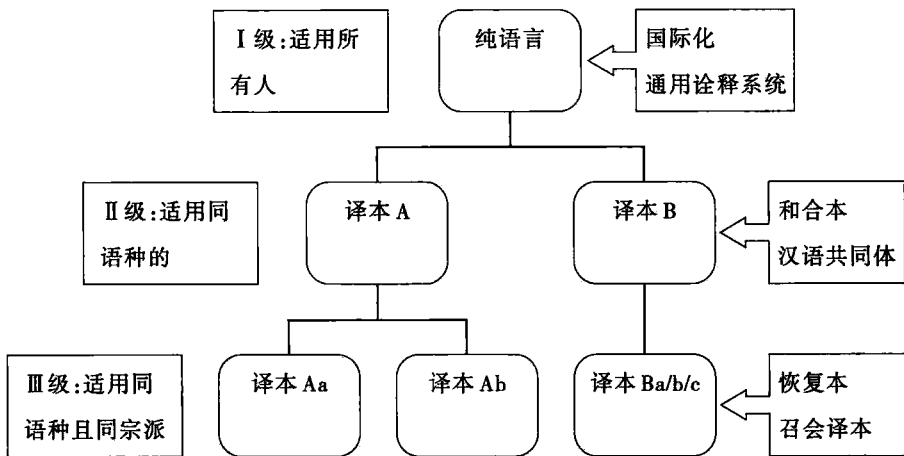


图9:圣经各译本的适用范围

### 三、六个圣经汉译本的定位

依据不同诠释传统产生的译本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依托不同译本的信徒或者教派之间产生误解,甚至纷争。我们根据译本的流通使用程度、教内人士重视程度、学者引用率和争议程度,选取“和合本”、“思高本”、“吕振中译本”、“新译本”、“冯象译本”和“恢复本”进行对照,见下表:

<sup>①</sup> 付昌玲:《翻译即解释》(硕士学位论文),合肥:安徽大学,2006年。

	本体 导向	相关 学科	文学 转向	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等	使用效果
和合本	神学 译学 平衡	强调	适中	“清楚简单”、“符合口语”、“字词应当是操官话的平民百姓所日常使用和明白的”、“不只是为了阅读,更要易于听懂” <sup>①</sup> 。“将我们神圣的信仰中的事实和信条以日常的语言译出,以便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信徒传讲福音故事。” <sup>②</sup>	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可与“钦定本”相媲美的中文圣经
思高本	神学	涉及	微弱	注重原文字义与拉丁语通行本(罗马教会传统上的标准经文)的解释,基本直译,不修文采 <sup>③</sup>	成为天主教专用中文圣经
吕振中	译学	关注	微弱	“惟于圣经须以直译为主,一词一句,一字一点,皆须注意周到”,追求“晓畅流利之直译”。“实可尽量应用中国之语法,或中国人所说得通而听得懂之新语法”,同时力求“语气连贯,轻重得体”,以达到“信达雅之最大均衡”。读者因素及对译者主体的要求:面向“一般非基督徒之读书人,与神学生,传道人,经学家等之研究”。 <sup>④</sup>	成为“首个直译汉语完全版” <sup>⑤</sup> ,“可以既用于教会内部也面向普罗大众” <sup>⑥</sup> ,“成为了圣经翻译的里程碑” <sup>⑦</sup> ,也成为国内很多研究圣经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
新译本	神学	强调	微弱	力求忠实于原文和运用现代语文进行翻译。	译本语言更加浅白,更容易理解,自出版以来受到华人教会人士的普遍欢迎。 <sup>⑧</sup>

① C. W. Mateer, “The Style of the Mandarin Bibl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1, No. 7, 1900, 332.

②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55.

③ 冯象:《雅各之井的大石——〈摩西五经〉前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x—xiii页。

④ 转引自吕荣安:《〈吕译旧新约圣经〉的翻译过程》,《生命季刊》2000年第4期。

⑤ 肖才望:《吕振中〈吕译旧新约圣经〉译本考察》,《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09—112页。

⑥ 马利安·高利克:《吕振中:一位中文圣经翻译家——献给苏黎世大学荣誉教授罗伯特·P·克萊默斯,于其80寿辰之际》,《圣经文学研究》(第7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13年,第72—94页。

⑦ 莱纳德·肯尼思·扬:《荣誉学位授予大会》,《香港大学学报》1973年第20期,第63页。

⑧ 任东升,门珑:《从汉译本序言看圣经汉译思想的流变》,《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51—56页。

冯象本	译学	强调	强烈	“回到原文善本,重新理解移译,即在旧译之外,为普通读者(包括教友)和学界,提供一种基于现代学术成果的忠实畅达而便于学习研究的译本”。“打破中文圣经同现代汉语文学的隔膜”,①“能够立于母语文学之林”②。	“最有意思和有意味的中文创作”③。
恢复本	神学	涉及	微弱	参照“和合本”,尽力保留其语体、节奏等全面优美;尽力探究原文精意,不加、不减、不改,用中肯浅顺的语句表达,凡照原文直译或古卷差异值得注意之处均参照七十士译本或其他古代译本。	召会专用圣经,被某些教内人士视为“异端”。

表1:六个典型译本比较

结合以上比较,我们尝试运用圣经汉译框架对这六个汉译本分别做出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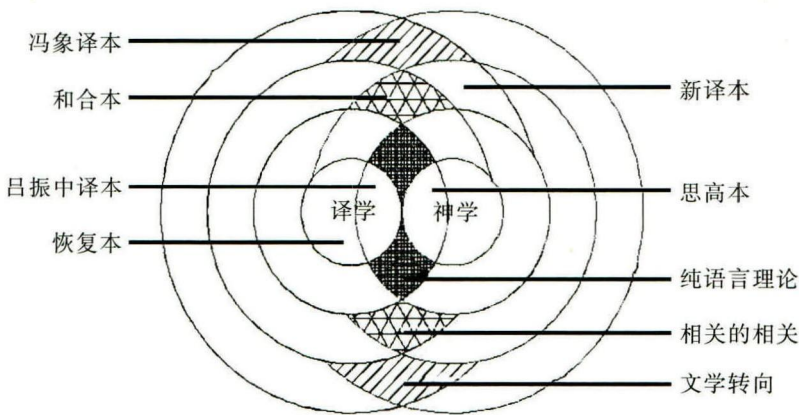


图10:六个现代圣经译本定位

① 冯象:《雅各之井的大石——〈摩西五经〉前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x页。

② 同上,第xiii页。

③ 黄锡木:《一部非信徒翻译的圣经——评冯象译注〈摩西五经〉》,《书城》2007年第9期,第37—39页。

**和合本:**20世纪初,翻译学和神学在我国刚刚启蒙,在西方教士和研究者的指导下,对于相关理论的研究虽未成熟,却已经开始实践,和合本就是此时翻译实践的产物。该译本综合了当时有限的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哲学考虑,在大综合、中庸的共识下定型。因而,和合本的位置就处于译学与神学各自相关学科的交集处。

**思高本:**强调天主教神学思想,以求构建与基督教不同的信仰;神学立场鲜明,也尊重当时较为成熟的翻译主流思想:忠实于原文。由此,“思高本”的位置就位于神学的核心区与译学“一环”的结合地带。

**吕振中译本:**从希腊文和希伯来原文逐字直译而来,保持了原文圣经的结构,所以该译本给人的感觉较生硬枯燥,适于教学。由于主张逐行对照,较少顾及当时的神学理解,也未考虑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其位置在译学的核心环内,与神学的“一环”相结合。

**新译本:**由原文、神学和汉语三个工作小组依次缜密斟酌译文,且追求“信达雅”,属于大型翻译团队成果,是圣经考古成果、现代汉语发展和翻译技巧提升三者结合的结晶。因此,该译本译学上的改进高于神学上的改动,位于神学“二环”与译学“三环”结合带。

**冯象译本:**位于译学与神学各自文化转向的结合处。主张翻译圣经无关信仰的冯象从纯学术及文学的角度翻译,引起很多争议。该译本的位置应处于译学和神学的最外围交集区。

**恢复本:**其定位大概是比较尴尬的。该译本的译者特别重视翻译准确性与其神学思想的重要关联,力求“差异最少,达译最准”<sup>①</sup>。秉承这种翻译认识的“恢复本”主要是服务于其“召会”的,也是召会不断追求圣经翻译意义准确性的结果,在语言转换层面被认为是“最准确的”<sup>②</sup>译本。鉴于

① 《〈圣经新约恢复本〉简说》,台北:财团法人台湾福音书房发行,1999年,第1页。

② 王台生:《〈圣经和合本〉与〈圣经恢复本〉的比较之一》,参见“生命的粮”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61774431\_0\_1.html,2014年8月1日读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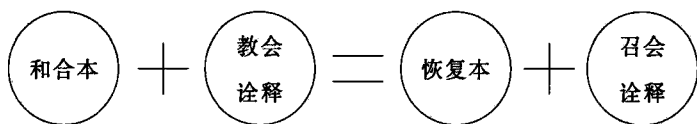
此,该译本首先是翻译学的成果,与神学的相关交叉学科出现交集。从这点来看,“恢复本”是译学思想主导、又为特定教会服务的译作,在翻译学研究上位置颇为独特。

在对以上译本进行对照和框架定位后,笔者发现,“恢复本”背后的信仰传统与主流信仰传统有较大差异,这导致其诠释与使用“和合本”的主流教会的诠释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图4、图5所示,当诠释传统发生异变时,就要与原译本“离婚”,寻找自己的新译本,即“恢复本”。这就导致有趣的现象:

(1)主流教会以自己的诠释传统对照“恢复本”的理解,认为“恢复本”是异端;

(2)召会以自己的诠释系统对照“和合本”的理解,感觉“和合本”错漏过多。

人的理解是主观的,一个人对于同一事件或场景的理解,可能与另一个人的理解颇为不同。正如维特根斯坦的鸭兔一体图<sup>①</sup>所展示的“视向盲”,一个人看到的东西往往不是那么轻易地、至少不是一眼就能被另外一个人观察到。“恢复本”、“和合本”与各自的诠释传统结合之后很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两边也许不完全是等式,但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可能由于历史原因,主流教会同召会之间很少对话,彼此之间缺乏诠释传统方面的交流 and 了解,各自译本的受众难免相互误解。

<sup>①</sup>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 四、结 论

圣经翻译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赋予“译本”形态的圣经以“原文”的神学权威。单从翻译意义上讲,文本诠释主宰文本翻译,文本诠释权的垄断和反垄断是争夺译本权威的前提。圣经汉译历来牵涉诠释传统的继承和更新,呈现出极大的社会复杂性。而众多汉译本的共时存在和读者分割,导致背后不同派别对基督教话语权的争夺和彼此间的分歧愈演愈烈。缓和这种局面的关键是理解,达至宗教理解的最佳境地有三种途径:“深入到别人的信仰中;深入到自己的信仰中;并且深入地理解普通的善。”<sup>①</sup>对不同译本赖以产生的诠释传统及其地位做出合乎逻辑的定位,将有助于实现相互之间的理解。

(程小娟 编)

作者高玉霞(1988—),山东昌乐人,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翻译理论和宗教翻译思想。已发表论文《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2015)、《钦定本翻译群落的生态理性》(2014)等十余篇。

---

<sup>①</sup> 大卫·福特:《面向21世纪的信仰间对话:犹太教、基督教与穆斯林围绕经典的辩读》,聂建松译,《民族论坛》2012年第3期,第8—18页。